从“资金供给”走向“行为引导”：商业银行深度助力企业可持续转型

余伯健　金　成

摘　要　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 ESG 表现领先，但尚未有效转化为对企业的可持续激励。本文以绿色金融作为 ESG 金融的代表，系统梳理商业银行在实践中的三大结构性失衡，即金融产品以信贷为主结构单一、服务聚焦“纯绿”项目忽略“趋绿”、大行主导与中小行参与不足。在此基础上，建议健全客户 ESG 绩效评价体系、创新和 ESG 绩效挂钩的金融产品、构建多方协同的 ESG 激励生态，将融资可得性、融资成本与企业 ESG 绩效动态深度挂钩，进一步促进金融资源向可持续领域的精准配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为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完善 ESG 治理体系提供了可实践的政策路径。

关键词　商业银行　ESG 实践　新发展理念

一、引言

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双重导向下，ESG 理念正加速融入我国金融体系与企业经营。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核心主体，我国商业银行正积极践行 ESG 理念，ESG 整体表现稳步提升。根据明晟(MSCI) ESG 评级数据显示，我国主要上市银行中已有逾半数获得 A 级及以上评级，四家银行跻身全球最高评级 AAA 行列，ESG 整体表现不仅优于国内非金融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在国际同业中亦位居前列。

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和问题是银行自身的 ESG 领先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对客户企业的绿色激励。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高碳行业及中小企业的 ESG 绩效整体偏低，企业绿色转型动力不足，“漂绿”现象时有发生。这一“银行热、企业冷”的传导阻滞，暴露出商业银行在资源配置方面尚未实现从“资金供给”向“行为引导”的范式跃迁，对企业客户提升 ESG 表现的带动效应有限。此外，商业银行在 ESG 实践中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和挑战，包括金融产品较为单一和集中、中小银行的参与程度整体偏低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

余伯健，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博士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金成，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助理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可持续金融研究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金融科技与安全治理)ESG 研究员。本文由 2025 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重点专项课题“新形势下上海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新路径和新举措研究”(2025-JD-02)、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这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绿色转型提出了更高要求。商业银行不应仅是绿色项目的资金供给者，更应成为企业可持续行为的塑造者与价值共创者。

因此，本文针对以下核心研究问题进行研究。一是如何将银行的 ESG 优势转化为客户的 ESG 绩效；二是金融体系如何通过机制创新，建立并强化企业的 ESG 表现与其融资可得性、融资成本的关联，从而内生化转型动力，将商业银行的 ESG 领先优势转化为实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银行-客户-社会”的多赢？

本文认为，破解这一传导难题，关键在于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 ESG 激励机制。通过建立本土化客户 ESG 评价体系、开发 ESG 绩效挂钩的金融产品、完善多方协同的生态制度，方能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改善”的转变，推动金融资源更精准地流向真正致力于绿色转型的企业。这不仅是提升绿色金融①效能的现实路径，更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性支撑。

二、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深化，学术界对商业银行 ESG 实践的研究日益深入，逐步构建起从宏观政策效应到微观传导机制的多层次分析框架。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政策驱动、机制识别和效果评估三条主线展开，为理解绿色金融的运行逻辑提供了重要基础。

在政策效应层面，学者普遍关注绿色金融政策对银行行为与绩效的影响。王宏涛 等（2023）基于 2008—2020 年 46 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发现，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升了银行的企业价值，其主要通过增强流动性创造、优化风险管理与改善成本收入结构等作用机制实现。蒋海 等（2023）则从风险承担视角指出，ESG 投资通过声誉溢出效应提升了银行的社会关注度，但也可能激励其承担更高风险，且该效应在股份制银行中更为显著。这些研究揭示了政策驱动下银行自身的适应性调整，但未深入探讨其对客户企业的外溢效应。

在微观传导机制方面，研究关注银行如何通过信贷关系影响企业行为。操群和许骞（2019）提出，金融 ESG 体系应涵盖“金融机构自身建设”与“对实体经济的间接影响”双重维度，为理解银行的双重角色提供了理论框架。朱光顺和魏宁（2023）进一步利用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逐笔贷款数据，发现负责任银行贷款显著提升了借款企业的 ESG 表现，其传导路径主要包括银行通过“退出威胁”施加合规压力、凭借议价能力要求企业改善治理及推动企业信息披露以增强外部监督。这一发现表明，银行不仅是资金供给者，更是企业可持续行为的塑造者。

在市场响应与经济后果层面，学者研究了金融竞争与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

① 绿色金融是指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等经济活动的金融活动（《GB/T 45490—2025绿色金融术语》）。

的促进作用。Xing et al.（2024）发现，银行竞争通过提升信贷可得性、增加企业绿色投资和改善环境信息披露，显著提高了企业 ESG 绩效，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及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效应更强。Yang & Zhou（2025）则聚焦转型金融，发现相关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强研发持续性，有效提升了高碳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且高 ESG 评级企业与缺乏银行关系的企业受益更为明显。这些研究揭示了金融体系支持企业绿色转型的潜力，但多将银行视为外部环境变量，而非主动的制度设计者。

尽管成果丰硕，现有文献仍存在明显短板。**其一，**研究视角多集中于“银行自身”或“银行-市场”关系，对“银行-客户”之间系统性激励机制的设计关注不足，尤其是如何将企业 ESG 表现与融资成本动态挂钩的制度安排，缺乏深入探讨。**其二，**对绿色金融的结构性矛盾，如产品单一、服务对象集中、中小银行参与度低等问题，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尚未上升到理论高度。**其三，**对如何通过能力建设与生态协同提升中小银行参与能力，研究尚不充分。

已有文献的研究空白，构成了本文的切入点。本文不局限于研究分析银行自身的 ESG 表现，而是聚焦于“如何将银行的 ESG 优势转化为对客户的可持续激励”，试图构建一个涵盖客户评价体系、绩效挂钩产品与多方协同生态的制度化传导机制，弥补现有研究在“机制设计”与“制度创新”层面的不足，为破解绿色金融“传导阻滞”提供可操作的实践方案。

三、商业银行 ESG 的内部领先与外部传导困境

在“双碳”目标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将 ESG 理念融入战略框架与业务流程，在 ESG 实践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整体 ESG 表现已跃居全球前列。然而，这一领先优势，尚未有效转化为对企业客户绿色行为的广泛激励，呈现出“银行热、企业冷”的传导断层。

（一）内部领先：银行自身 ESG 实践的全球对标

从资源配置导向看，我国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可持续金融[①]实践，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和乡村振兴等领域持续加大资源倾斜，切实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在绿色金融方面，商业银行积极支持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我国商业银行绿色贷款余额从 2018 年末的 8.2 万亿元攀升至 2025 年 6 月末的 42.4 万亿元，年均增速超过 30%，存量规模稳居世界第一。[②]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绿色升级（占比超 50%）、清洁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其中逾三分之二用于具有直接或间接碳减排效益的项目，有力支撑了能源结构转型与低碳技术推广。在普惠金融方面，商业银行持续提升金融服务的

① 可持续金融是指支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体制和市场安排，并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因素系统地纳入金融活动的各个环节（ISO/TR 32220:2021《可持续金融——基本概念和关键倡议》）。

② 数据来源：人民银行《2025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覆盖面与可得性，助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截至2025年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5.6万亿元，同比增长12.3%，增速比各项贷款高5.2个百分点①，有效缓解了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科技金融方面，商业银行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助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壮大。截至2025年6月末，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27.4万家，获贷率50%，比2024年同期高3.2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达3.46万亿元，同比增长22.9%，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6.1个百分点②，显著提升了金融对科技创新的适配性与支持力度。在服务乡村振兴方面，商业银行持续强化对“三农”领域的信贷支持，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截至2025年6月末，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达53.19万亿元③，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农业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商业银行在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技金融、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导向的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充分体现了“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的制度要求，展现了金融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担当。

从信息披露与治理水平看，上市银行ESG透明度显著提升。全部42家A股上市银行均发布了2024年度的社会责任或ESG报告，披露覆盖率达100%，远高于A股上市公司同期约46%的平均水平。④国内外主流的ESG评级结果均显示我国商业银行整体表现优异。例如，国际的明晟（MSCI）对我国28家上市银行的评级中，半数获A级及以上，其中4家获评最高AAA级；国内的华证ESG评级中，AA级及以上的商业银行占比达38.1%，A级及以上超62%，均显著高于非金融上市公司均值。⑤

综上所述，我国商业银行在ESG“自身建设”维度已具备全球竞争力，部分大型银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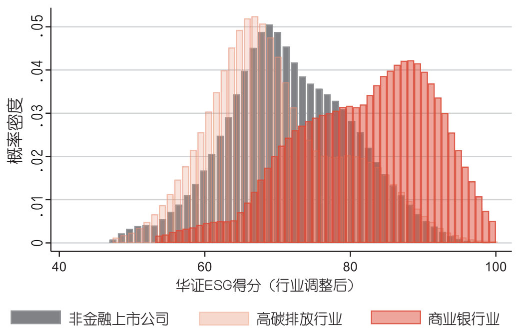
（二）外部阻滞：银行优势向客户传导的机制缺位

尽管银行自身ESG表现突出，但其对客户企业的绿色激励效应仍显不足。一个直观的现实是，银行的高评级并未带来客户企业ESG水平的同步提升。

数据显示，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整体ESG得分仍处于中低水平，尤以钢铁、水泥、石化等高碳行业为甚。以华证2023年度ESG评级为例，商业银行的得分分布显著右移，集中于A级以上区间；而高碳行业上市公司则普遍集中在B级及以下，呈现“银行领先、实体企业滞后”的鲜明反差（图1）。这一现象表明，当前尚未建立起将银行ESG能力转化为客户绿色动力的激励机制。

这一“内部领先、外部阻滞”的双重图景，凸显了当前绿色金融体系的核心矛盾，即金融机构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①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③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二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
④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协会《2025年上市公司可持续信息披露情况分析报告》。
⑤ 数据来源：明晟（MSCI）ESG数据库。



数据来源：华证 ESG 数据库。从华证指数公司 ESG 数据库获取 A 股上市公司 ESG 评价数据。其中，商业银行业包括 A 股 42 家上市公司样本；非金融上市公司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金融业”以外的全部上市公司；高碳排放行业包括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建材、钢铁、有色、石化、化工、造纸、民航和发电行业上市公司。在 Stata 统计分析软件中使用密度函数工具 Kdensity 作图得出不同上市公司分类的 ESG 分布。

图 1　上市公司华证 ESG 得分分布的密度函数图

能力，但缺乏有效激励客户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若不能破解这一传导难题，银行的 ESG 优势将停留在数量层面，难以真正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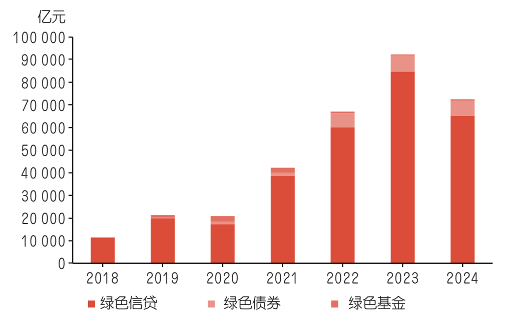
四、商业银行 ESG 实践的结构性失衡

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在 ESG 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尚未有效转化为对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的广泛支持。这一“传导阻滞”现象的背后，是绿色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若仅从技术层面修补产品或扩大规模，难以突破瓶颈；唯有从结构上识别并化解关键失衡，方能实现金融资源向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精准配置与持续激励。本文将当前挑战归结为三大结构性失衡：产品结构失衡、服务对象失衡与参与主体失衡。这三重断层相互交织，共同制约了可持续金融从“规模扩张”向“效能提升”的转型。

（一）产品结构失衡：信贷主导与工具单一

当前我国 ESG 金融供给高度依赖绿色信贷，呈现出“一贷独大”的格局。据 Wind 数据测算，2024 年新增绿色金融规模中，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占比超过 90%，绿色债券约占 8%，而绿色股权融资、绿色基金及其他创新工具合计不足 2%（图 2）。这一结构严重限制了金融体系对不同类型绿色项目的适配能力。

绿色信贷虽具规模优势，但其债务属性决定了风险偏好偏低、期限匹配难、灵活性不足。对于技术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现金流不确定的低碳转型项目，银行往往因缺乏有效的风险识别与对冲工具而望而却步。相比之下，欧盟等发达市场已广泛运用绿色股权基金、转型债券、碳收益互换等多元化工具，形成“信贷 + 股权 + 保险 + 衍生品”的立体化支持体系。我国金融工具的单一性，导致金融产品难以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尤其



数据来源：绿色信贷新增规模根据 Wind 经济数据库中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数据计算得出；绿色债券数据根据 Wind 债券数据库中绿色债券的发行数据计算得出；绿色基金数据通过 Wind 基金数据浏览器中万得绿色分类主题基金年度规模计算得出。

图 2　我国绿色金融组成结构（2018—2024）

在高碳行业“不会转、不敢转”的关键阶段，缺乏灵活的金融解决方案。

（二）服务对象失衡：聚焦“纯绿”与忽视“转型”

我国目前的绿色金融“光谱”过窄，存在服务对象的失衡，难以穿透至产业链深处，形成广泛的行为引导效应。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支持重心长期集中于“纯绿”项目，即本身具备显著环境效益的新建基础设施，如风电、光伏、公共轨道交通等。这类项目支持政策清晰、技术成熟、风险可控，易于纳入银行授信体系。然而，据估算，我国“纯绿”经济活动占 GDP 比重不足 10%（张永冀，2024），而高达 90% 的传统经济部门，如钢铁、水泥、农业、航运等，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碳”产业，却具有巨大的减碳降碳潜力，也蕴含着巨大的转型融资需求。

当前绿色信贷投向中，超过 50% 集中于基础设施绿色升级领域，存在明显的“重建设、轻治理”“重增量、轻存量”倾向。大量高碳行业企业虽有转型意愿，却因不符合“纯绿”认定标准而难以获得融资支持。与此同时，随着大型基建项目趋于饱和，银行获客成本上升，绿色贷款的利率优势也在市场利率整体下行背景下逐步收窄。若不及时拓展服务边界，绿色金融将陷入“优质项目荒”与“转型需求荒”并存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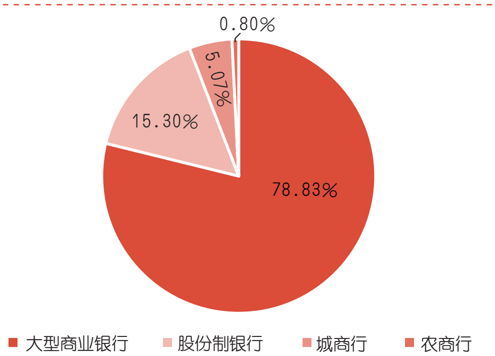
银行风险偏好低、期限匹配难、技术评估能力弱等问题制约了对中小企业和高碳行业转型项目的覆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现有金融工具缺乏对“转型过程”的激励机制。银行关注的是项目是否“已绿”，而非企业是否“趋绿”。这导致企业缺乏持续改善 ESG 绩效的动力，甚至出现“漂绿”行为，仅通过包装少数绿色项目获取融资，而核心业务仍维持高碳模式。

（三）参与主体失衡：大行主导与中小行参与不足

绿色金融的供给结构呈现高度集中化。以 A 股上市银行 2024 年报数据来看，国有六大商业银行占据全市场绿色信贷余额近 80%，而城商行、农商行合计占比不足 6%（图 3）。相比之下，在一般信贷市场中，国有六大商业银行占比 67%，城商行、农商行占比近 10%。这一反差表明，绿色金融尚未实现“多层次、广覆盖”的生态格局。

其根源在于能力与激励的双重缺失。一方面，绿色项目认定、环境风险评估、碳核算等专业能力主要集中在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受限于人才、数据与风控模型，难以独立开展复杂业务；另一方面，绿色项目普遍规模大、周期长、资本占用高，对资本约束本就紧张的中小银行而言，投入产出比偏低，参与意愿不足。

结果是，绿色金融资源进一步向大型企业、大型项目聚集，而本地化、特色化、中小微企业的绿色融资需求被边缘化。这



数据来源：上市银行 2024 年度报告。作者手工整理了 42 家 A 股上市银行年报中的绿色信贷规模数据，再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银行类型分类统计。

图 3 上市银行绿色信贷结构

不仅削弱了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广度与深度，也加剧了区域间绿色转型的不平衡。若不打破“大行垄断、小行旁观”的格局，绿色金融将难以真正渗透至经济毛细血管，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破解结构性失衡的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

面对绿色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产品结构、服务对象与参与主体三重失衡，单纯依赖银行自发创新或局部试点难以实现系统性突破。唯有通过制度化设计，构建激励相容、权责清晰、多方协同的可持续金融生态，方能将商业银行的ESG优势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本文提出三方面创新路径，分别对应前述三重失衡，以ESG金融的主要构成绿色金融为切入点，探讨从“项目融资”向“行为引导”、从“大行主导”向“生态共治”转型之策。

（一）建立企业ESG评价体系：支持产品多元化的要素基础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企业客户评估中，普遍侧重于财务表现和短期价值，主要依据企业历史及当前经营状况进行信贷决策，尚未充分纳入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政策趋严、市场需求转型等因素对企业长期发展的影响。这导致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乏力，根源在于缺乏统一、可信且可操作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标准。银行难以量化企业的环境风险与低碳转型潜力，信贷定价仍过度依赖传统财务指标和抵押品，绿色属性多作为补充性参考，制约了金融资源向绿色低碳领域的有效配置。

为破解这一瓶颈，亟须构建本土化、动态化、可穿透的客户ESG评价体系，作为金融产品创新的基础性要素支撑。该体系应以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从环境（E）、社会（S）、公司治理（G）三个维度综合评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并结合中国国情增设“中国特色指标”，适度弱化国际评级方法论的直接套用，降低对国际评级结果的依赖，增强评估体系的情境适配性与现实解释力。可考虑由监管部门主导建立统一的本土化ESG信息披露与评价制度，规范披露标准。各商业银行据此构建动态量化ESG评价模型，生成客户的ESG评价结果。

客户ESG评价作为关键要素基础，商业银行可广泛应用于ESG主题的银行贷款、债券承销、债券投资、财务顾问等，还可考虑应用于与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理财子公司等的ESG相关业务合作。通过将客户ESG评价结果嵌入不同金融产品的设计、授信、后续管理等流程，将客户的ESG表现与融资成本、额度等核心利益深度绑定，这不仅能有效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也有望带动其他类型的ESG金融产品谱系的扩宽，改变绿色信贷为主的单一格局，形成可持续金融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

（二）推广ESG绩效挂钩金融产品：实现从“已绿”到“趋绿”的激励转型

为破解服务对象集中于“纯绿”项目的局限，必须将金融支持从“结果认定”转向“过程激励”，引导企业持续改善ESG表现，关键在于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等绩效导向型金融工具，并建立标准化机制。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是一种将贷款利率与借款人的ESG绩效目标动态挂钩的创新融资工具，其核心在于通过“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的双向机制，推动企业主动

改善可持续发展表现。与传统绿色贷款聚焦“纯绿项目”不同，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不预设资金用途，而是支持企业整体转型战略，尤其适用于钢铁、水泥、航运等高碳、难减排行业，有效拓展了绿色金融的覆盖边界。

该类产品以可量化、可验证的 ESG 关键绩效指标（KPI）为基础，如“碳排放强度”或“减碳降碳幅度”等，并要求指标经第三方机构验证后纳入贷款合同。在利率设计上，采用“阶梯式浮动”机制，即企业每达成一个年度 KPI，贷款利率即下调一定基点，未达标则不变或上浮，实现成本与绩效的动态联动，有效抑制“漂绿”行为。同时，标准化审批流程，为企业提供长期稳定的融资安排。

此外，商业银行可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探索“转型资金 + 转型顾问”模式，将信贷支持与碳核算、转型路径设计、碳资产托管等非金融咨询服务相结合，帮助企业破解能力建设短板的技术与信息瓶颈。通过建立与企业的 ESG 双向反馈机制，还可提升信息披露质量，缓解信息不对称。

发展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标志着金融支持从“结果认定”向“过程激励”的转变，有助于引导企业持续提升 ESG 表现，为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形成长效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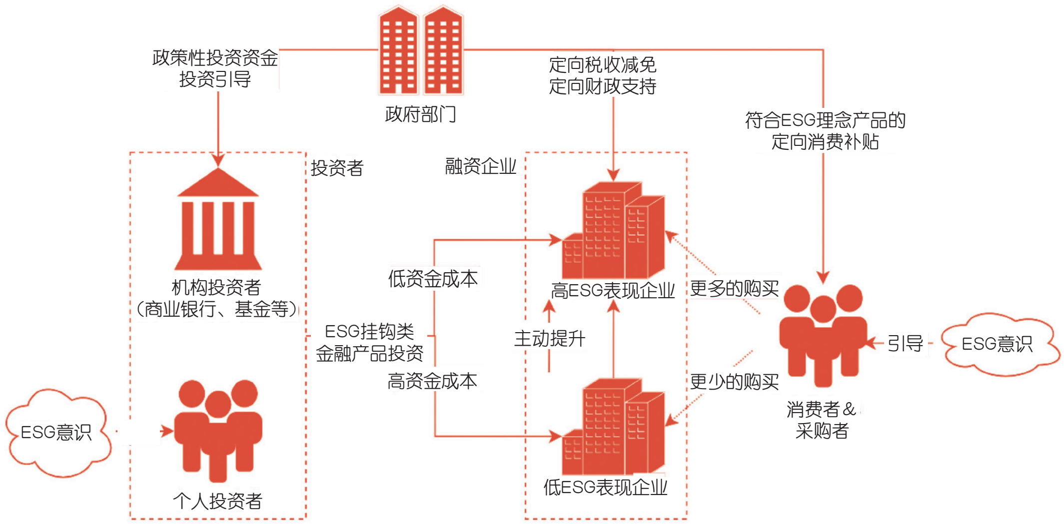
（三）构建多层次参与生态：拓展可持续金融的供给主体与 ESG 正向激励体系的协同健全

ESG 生态的良性运转不能依赖银行“单兵突进”。客户 ESG 评价体系与可持续发展挂钩类金融产品有效发挥作用，离不开健全的 ESG 激励机制和协同联动的生态体系，需要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投资者、政府之间的多方协同（图 4）。

如上文所述，当前“大行主导、中小行缺位”的格局制约了可持续金融的覆盖面，必须通过机制设计降低中小银行参与门槛，激发其区域服务优势。鼓励建立“牵头行-参与行”联合银团模式，由大型银行作为牵头行输出客户 ESG 评估能力与风控经验，城商行、农商行作为参与行发挥本地客户触达与灵活审批优势，提升可持续金融服务的区域可及性与差异化水平。同时，提升其他类型金融机构参与积极性，探索建立“银行 + 保险 + 企业”转型金融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可实现“专业能力输出”与“本地触达优势”的优势互补，推动可持续金融逐步从集中化、中心化的供给模式，转向更具包容性与适应性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从而更广泛地支持不同规模、不同区域企业的可持续转型。

此外，除商业银行信贷服务等之外，还需推动 ESG 理念向更大的社会范围传播和传导，并进一步完善健全起针对企业的“表现优异-融资便利-价值提升”的体系化的正向激励反馈机制。在资本市场上，促进高 ESG 表现企业更易获得投资者的青睐，降低股权与债权融资成本；在实体经济中，引导加强消费者与采购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同，也将转化为企业更高的销售收入与品牌溢价。在财政政策上，通过税收减免、财政支持奖惩挂钩方式，激励企业提升 ESG 表现。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为引导金融等资源更精准支持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治理，推动生态环境数据、碳账户与金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破“信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 4　ESG 激励机制的生态建设

息孤岛”。

六、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业总体 ESG 水平在所有行业中显著领先，其国际国内 ESG 评分逐年稳步提升，现已处于全球同行业前列。从主营业务中与 ESG 相关的业务成果来看，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规模快速增长，信息披露质量逐年提升。

但从整体来看，我国的 ESG 经济活动展现出“银行热、企业冷”，使得商业银行的 ESG 优秀实践无法进一步传导到实体经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 ESG 金融业务在多方面的口径窄，导致供需不匹配。一是 ESG 金融产品服务种类单调，多数 ESG 活动以信贷服务主导，存在供给种类不足；二是服务对象单一，贷款企业以“纯绿”特征为主，而碳排基数较高企业仍然较难为其绿色转型经济活动融资；三是参与 ESG 业务的银行以大型银行为主，ESG 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

为了更好地提升商业银行的 ESG 引领作用，应当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从标签化向实质性发展，从合规驱动逐步转变为可持续价值创造，建议以构建企业 ESG 评价体系为抓手，并将企业 ESG 评价结果更深入地应用于信用风险定价体系，开发推广与 ESG 动态绩效挂钩的金融产品，并营造广泛激励和数据协同的生态，构建一个“评价为基-产品驱动-激励协同”的可持续金融新机制，以实现金融资源更高效与精准配置。这实际上意味着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的角色深化，即不再只是绿色项目的资金提供者，而是通过能力建设与综合服务，成为企业可持续转型的协同支持者与长期价值伙伴。

当前，我国正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此背景下，金融体系的

角色可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塑造可持续发展路径。关键在于通过制度化机制设计，将企业 ESG 表现纳入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使其与融资可得性、融资成本形成稳定预期。唯有如此，方能推动企业从外部合规压力下的被动转型转向基于长期价值提升的主动改善。当良好的 ESG 表现切实转化为企业在资本获取、市场声誉与风险管理方面的竞争优势时，可持续发展才可能实现从理念倡导到实质性行为变迁的跃迁。这不仅关乎金融效能的提升，更是构建支持中国式现代化的可持续金融体系的核心议题。N

学术编辑：张毓

参考文献

[1] 操群,许骞.金融“环境、社会和治理”(ESG)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监管研究,2019(4):95-111.

[2] 蒋海,陈霜怡,王梓峰.新发展理念下的ESG投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共二十大报告绿色发展视角[J].金融经济学研究,2023,38(1):65-83.

[3] 王宏涛,马妍,王一鸣,等.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与银行企业价值——基于绿色金融视角[J].南方金融,2023(2):21-35.

[4] 张永冀.以绿色金融助力全面绿色转型[N/OL].光明日报,2024-09-06[2025-08-26].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4-09/26/nw.D110000gmrb_20240926_2-06.htm.

[5] 朱光顺,魏宁.负责任的银行贷款与上市公司ESG表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40(12):133-151.

[6] Xing T,Li X,Feng N.Is bank competition conducive to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2024(95).

[7] Yang T,Zhou B.Does transition finance policies persistently fuel green innovation in brown firms? Investigating the roles of ESG rating and bank connection[J].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2025(90).

From "Capital Supply" to "Behavioral Guidance" : Deep Financial Empowerment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Enterprises

YU Bojian[1,2]　JIN Cheng[3]

(1.Shanghai Rural Commercial Bank Postdoctoral Fellow; 2.Postdoctoral Fellow at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3.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and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have led the financial sector with their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 But this has yet to be adequately translated into effective and actionable incentiv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their corporate custom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commercial banks' ESG financial practices, with a focus on green finance. It also identifies three structural imbalances: a reliance on credit-based financial products, a narrow focus on "pure green" projects at the expense of "transitioning to green" initiatives, and a dominance by large banks with in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from smaller institution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the paper recommends an ES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centered on clients, the development of credit products linked to ESG performa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SG incentive ecosystem through multi-party collaboration. By closely linking financing accessibility and costs with a dynamic ESG performance by enterprises, financial resources can be more precisely allocated to sustainable sectors. That in turn can advanc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policy pathways for deepening green finance reforms and improving ESG governance systems.

Keywords Commercial Banks, ESG Practice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JEL Classification G21 G32 Q56